

「前衛」的文學觀和技巧

評劉以鬯的《酒徒》

楊升橋

二十年前拜讀過劉以鬯先生的《酒徒》，今天重閱，仍然覺得意識流的技巧非常可取。書中第一人稱的「我」所提出的「文學觀」，尤其要超越五四文學作品水準的見解，在六十年代，十分「前衛」；在九十年代，仍然不落伍。

我不敢肯定書中第一人稱所發表的文學觀，是否就是劉以鬯先生的文學觀，若是，劉先生在「現代文學」筆路藍縷的時候，在許多「現代」名家仍在摸索前進的時候，已經能夠提出那樣「前衛」、「激進」的見解，不愧為「現代文學」倡導者之一，應享有他應得的地位。

《酒徒》舊版出版於一九六三年，在報章上連載應該是同年或更早的事。似乎也在六十年代，台灣一些「前衛」作家，在創作上、理論上亦在尋找一條能夠超越五四的道路。《現代文學》創刊於六〇年左右（文學雜誌當然早一些），余光中也發表了《下五四的半旗》。劉先生在《酒徒》一書中的「先見之明」，似乎被「囚」了幾十年，甚少被世人論及，對劉先生而言，非常不

公平。

六十年代初，劉先生（假設書中「我」的觀點就是劉先生的觀點）對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，就論過這樣的「成一敗」：

「在過去幾十年中，我們也曾產生過像曹禺那樣傑出的劇作家。他的『雷雨』、『日出』，應該被認作五四以來最大的收穫。此外，魯迅的『阿Q正傳』無疑是一個傑作，可以與海明威的『老人與海』相提並論。長篇小說方面，李劫人的『死水微瀾』、『暴風雨前』、『大波』寫得很不錯，應該受到重視。我們的新詩一直在摸索中，直到近幾年，才出現了像痲弦這樣的新銳詩人。至於短篇小說，沈從文是最大的功臣。」（頁一四二，酒徒，遠景）

簡單扼要，就勾勒出小說、戲劇和新詩方面的「成就」。曹禺、魯迅、李劫人、沈從文、痲弦等人，都是可以令人同意的優秀作家，尤其《阿Q正傳》更是必傳之作。

他對「目前」所謂「文藝小說」的評語：

「目前的所謂『文藝小說』根本連五四時代的水準都夠不上。有人努力於這一水平的攀登，即使達到了，依舊是落後的。實際上，五四時代的小說與同時代的世界一流作品比較，也是落後的。如果今天的小說家仍以達致五四水準就感到滿意的話，我們就永遠無法在世界文壇佔一席之地了。……現實主義早已落伍，甚至福樓拜也說過這樣的話——我們手邊有複音的合奏，豐富的調色板，各種各樣的媒介……但是我們缺乏的是：(一)內在的原則；(二)事物的靈魂；(三)情節的思想。福樓拜是現實主義大師，他的話當然不會是危言聳聽。事實上，現實上，現實主義單方面發展，絕對無法把握全面的生活發展……」(頁八三)

獨具慧眼地、一針見血地，就刺中「目前」一些所謂「文藝小說」膚淺皮相的「要害」。

對今後我們所該努力的方向，他說：

「首先，必須指出表現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應該用新技巧；其次，有系統地譯介近代域外優秀作品，使有心從事文藝工作者得以洞曉世界文學的趨勢；第三，主張作家寫內在真實，並描繪『自我』與客觀世界的鬥爭；第四，鼓勵任何具有獨創性的、摒棄傳統文體的、打破傳統規則的新銳作品出現；第五，吸收傳統的精髓，然後跳出傳統；第六，在『取人之長』的原則下，接受並消化域外文學的果實，然後建立合乎現代要求而能保持民族作風民族氣派的新文學。這樣的『轉變』，旨在捕捉物象的內心。從某一種觀點來看，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『寫實』的，而且是真正的『寫實』。……換一句話說：今後的文藝工作者，在表現時代思想和感情時，必須放棄表面描摹，進而作內心的探險。」(頁一四三)

這種衝激性的見解，革命似的「宣言」，即使對九十年代的文壇，尤其對星馬一帶文藝工作者而言，仍然有如暮鼓晨鐘。(我奇怪《酒徒》舊版已出版了近三十年，這「文學觀」對星馬文藝工作者的影響，似乎並不太大。)

最後，他更大膽地宣佈：

「現實主義應該死了，現代小說家必須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

。」(頁八三)

以上列舉近乎「文學革命」的「宣言」，若能發表在六十年代的台灣，必定會換來熱烈的掌聲而被目為「大師」級的人物。(若當年劉先生去的是台灣而非香港，一定可以成爲年青一輩創作的導師，對台灣文壇貢獻殊大。)

我在大馬時，偶而也翻閱當地報章的文藝版，發現一般小說的對話，常常是「議論連篇」的。我以為，適當處理小說中的一「議論」，諸如用書信或日記的形式來表達，似乎就不會對作品的藝術性造成太大的殺傷力。劉先生的意識流手法，以及某些作家可貴的「戲劇化」呈現，應該比較可以保持藝術的完整性。

就內容而言，《酒徒》是部不滿現狀和反現實的作品。作者要表現的，是在金錢、物慾主義下喪失了良知、靈魂和人性。張麗麗、雷老太太、楊露、司馬莉，甚至麥荷門，固是光怪陸離社會中的可憐蟲，沉溺於酒色無法自拔的「我」，何嘗又是一個完美的人物。書中主角以酒精麻醉自己，似非唯一的出路。但對周遭環境適應能力之缺乏，對某些觀念的執著(如認爲武俠小說無價值等)，那無「天降大任於此身」的抱負，亦無「力挽狂瀾」的勇謀，沉迷酒色因此也就變成唯一的出路。表面上看來，主角的「自棄」心態，和《吉陵春秋》、《家變》呈露人性醜陋和墮落面一樣，帶給讀者的恐怕是「絕望」而非「希望」。但若從「自棄」心態之因的環境來探討並加以補救，《酒徒》還是有它積極的一面，還是可以帶給讀者「希望」的火花。(何況主角還提出許多保障作者權益，如何杜絕盜印商等等積極性建議。)

書中人物，最令我驚奇的是司馬莉。她崇拜「莎岡」，讚譽「納布哥夫」的《羅麗姐》，她有起碼的文學修養，但十七歲的她，竟隨便跟男人上床，打過胎，心境有如一個厭世的老妓。「放浪形骸」的人似乎不一定須「懂」文學，一個可以隨便跟人做愛的「墮落」女孩都喜歡看文學，何以文學刊物竟無銷路？書中的場景，不外是作者熟悉的報館、住所、醫院、餐廳和風月場所，因此光從這些場景來看，《酒徒》只能算是香港六十年代某些現象的局部反映，而非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。但工商業社會過度膨脹發展，導致人和文藝商品化和庸俗化，尊嚴和高貴情操的喪失，以及由此而引起「焦慮、不安」的情緒，卻有其世界共同性

——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思潮的特徵，就是「焦慮、不安、苦悶、失落、怖懼」精神面貌的浮現。

全書寫得最驚心動魄的，是回憶中的那幾場戰爭。劉先生應該多寫這些動盪的點點滴滴，因為由這些點點滴滴，使我們這些未經憂患的後輩，能夠看到數十年來中國社會動盪的一個「縮影」。可惜戰爭場面在書中只是曇花一現，作者的筆觸馬上又回到六十年代香港「醜陋」的現實，讓「我」繼續週旋於那幾個可憐的女人身邊，重複的喝酒，重複的醉語，重複的「逃避」，重複的「矛盾」。

劉以鬯先生是前輩作家之中「碩果僅存」的少數優秀作家之一，他有的是人生經歷，有的是優越的寫作技巧，他當然會擅用這些優點，以「百萬字來表現一羣小人物在一個大時代裏的求生經驗，採用心理分析的方法，寫北伐，寫國難，寫抗戰，寫香港」（這是書中主角的心願），一定可以成爲一部「轟轟烈烈」而又充滿血淚的小說。

轟轟烈烈的北伐過去了，我不知它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優秀的作品，轟轟烈烈的抗戰也過去了，我也不知它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值得一讀的佳作，長期的動盪，永無休止的國難，使每個中國人的心都在滴血，劉以鬯先生不爲我們寫下這些歷史的見證，請問應由誰來寫？

九一年六月十二日於舊金山

後記

· 本文是拙著《傳統下的「獨白」》——從另一個角度看王文興的《家變》》其中的一篇。該書將由拓荒出版社出版，港台星馬

美加同時發行，要目如下：①顏元叔的《舞會裝飾人》②余光中的《北望》和《廣九鐵路》③梁園的「最後一根火柴」④「前衛」的文學觀和技巧——評劉以鬯的《酒徒》⑤《世界中文小說選》：馬華九篇小說讀後感⑥現代散文的奇峯——評溫任平《黃皮膚的月亮》⑦《走入現代，又回歸傳統》——溫任平周望樺文字技巧初探⑧另一種鄉愁——如何讀《暗香》和《朝笏》⑨悲天憫人的胸懷——從另一個角度看《吉陵春秋》⑩再談李永平的《吉陵春秋》⑪掌握了「真意」——「朱炎《我讀日頭雨》」讀後感⑫傳統下的「獨白」——從另一個角度看王文興的《家變》⑬婚姻·出路·鄉愁——評潘雨桐的《霧鎖重樓》⑭永恒的「普遍性」——評商晚筠的《痴女阿蓮》⑮評張貴興的兩篇伏「虎」記⑯傳統美德和藝術的芬芳——評張愛玲《碧螺十里香》。附錄多篇並有長序「傷心之旅」。